

# 敦煌蒙書《上大夫》寫本 與唐五代宋初的識字教育

任占鵬\*

## 摘要

本文利用 19 件敦煌文獻中的《上大夫》寫本討論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識字教育的內容、特點、方法。在先學基礎上豐富了識字蒙書的種類，補充介紹了一些非蒙書識字內容，嘗試論證了各蒙書的使用順序及其在識字教育中的用途，並就敦煌寫本所呈現出的識字習字方法做了詳細說明。

**關鍵詞：**敦煌寫本、《上大夫》、識字教育、習字、順朱、做書

---

\* 任占鵬現職為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講師。

## 一、前言

20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一批蒙書寫本，為探究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識字教育提供了珍貴資料。前學就其中的《千字文》、《開蒙要訓》、《俗務要名林》、《上大夫》等識字蒙書進行了諸多探討，取得了豐富成果，不過前期研究多是針對某一種蒙書。隨著敦煌蒙書被不斷發現，學界開始對識字蒙書進行整理和分類，試圖總結當時識字教育的內容與特點。雷僑雲先生《敦煌兒童文學》一書中整理了《千字文》、《開蒙要訓》、《百家姓》，分別探討了三者的作者、形式和內容，將三者概括為「敦煌兒童字書」。<sup>1</sup>宋新民先生博士論文《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研究》整理了《千字文》和《開蒙要訓》，主要探討了二者的作者、內容、影響。<sup>2</sup>周祖謨先生《敦煌唐本字書敘錄》一文將敦煌文獻中的唐本雜字書分為五類：童蒙誦習書、字樣書、物名分類字書、俗字字書、雜字難字等雜抄。<sup>3</sup>周先生劃分出的童蒙誦習書（包括《開蒙要訓》、《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百家姓》）和物名分類字書（包括《俗務要名林》和《雜集時用要字》）現在被普遍認為是識字類蒙書。汪泛舟先生《敦煌的童蒙讀物》一文將敦煌的童蒙讀物分為識字類、教育類、應用類，識字類又分三種情況：一是文字互不連貫，單純識字的課本，如各種雜字、難字；二是語句連貫、押韻，並表明一定意義的識字課本，如《千字文》、《開蒙要訓》、《李氏蒙求》等；三是姓氏識字課本，如《百家姓》、《姓望書》、《姓氏書》等。<sup>4</sup>鄭阿財先生先後發表《敦煌蒙書析論》、《敦煌童蒙讀物的分類與總說》、《敦煌蒙書》三文對敦煌識字類蒙書進行整理和分類，並在與朱鳳玉先生合著的《敦煌蒙書研究》一書中在分類的基礎上對各蒙書進行了具體研究。鄭、朱二先生按照內容和用途把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分作：綜合性識字類蒙書，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姓》；雜字類蒙書，包括《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俗字類蒙書，包括《碎金》、《白家碎金》；習字類蒙書《上大夫》。<sup>5</sup>最近，王金娥《敦煌藏經洞所出識字類蒙書略論》一文也對敦煌識字類蒙書進行了整理，分

<sup>1</sup>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31-57。

<sup>2</sup> 宋新民：《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sup>3</sup> 周祖謨：〈敦煌唐本字書敘錄〉，收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40-55。

<sup>4</sup>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頁104-107。

<sup>5</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7。

作三類：一是綜合識字類蒙書，主要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二是姓氏識字類蒙書，主要包括《百家姓》、《姓望書》、《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姓氏書》、《姓氏錄》；三是習字類蒙書《上大夫》。<sup>6</sup>王金娥還指出敦煌識字教育的特點是識字與習字、書法相結合。

通過前學的研究，我們對敦煌文獻中的識字蒙書的種類有了大體瞭解，對部分識字蒙書的內容和性質等有了較深入的認識，為本文利用《上大夫》寫本探析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識字教育的內容和特點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前學的研究較少關注到寫本本身，所以對各蒙書之間的關係、各蒙書在識字教育中的地位尚未有足夠認識，對寫本中其他內容尚未有足夠關注。敦煌識字蒙書的寫本主要是由學生在識字過程中寫下的原始資料，光探討蒙書而不注重寫本，將不可避免地遺漏很多重要信息。

筆者在整理識字類蒙書之時，注意到一些被前學稱為「雜寫」的寫本中往往書寫有多種識字習字內容，特別是被鄭、朱二先生判定為習字蒙書的《上大夫》寫本。《上大夫》全文為「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筆畫簡單，內容短小，編撰於唐前期，作者不明，宋以後演變為《上大人》，成為後世啟蒙教育中普遍首用的習字蒙書。<sup>7</sup>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晚唐敦煌寫本 S.1313《大乘百法明門論義序釋》第七則載：「言演半滿於言派者，且如世小兒上學，初學《上大夫》等為半字，後聚多字成一字者，令盡識會為滿字。」<sup>8</sup>由此證明《上大夫》在唐代已是小兒的初學蒙書。如今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 36 件《上大夫》寫本，<sup>9</sup>數量僅次於《千字文》和《開蒙要訓》，足以說明該蒙書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識字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寫本中《上大夫》由於簡短且多與其他內容寫在一起，前學在確定寫本名稱之時多將這些寫本稱為「雜寫」。在這樣的「雜寫」中，筆者不僅發現有《千字文》、《開蒙要訓》、《尚想黃綺帖》、《太公家教》等，還有一些尚未被學界充分關注到的《敦煌百家姓》、《牛羊千口》、《上土由山水》、《正月孟春猶寒》等蒙書，以及

<sup>6</sup> 王金娥：〈敦煌藏經洞所出識字類蒙書略論〉，《語文學刊》第 37 卷第 5 期（2017 年 10 月），頁 119-126。

<sup>7</sup> 拙文：〈論唐代敦煌蒙書《上大夫》與後世《上大人》的關係〉，《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3 期（2021 年 5 月），頁 42-52。

<sup>8</sup>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2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09。

<sup>9</sup> 〔日〕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再論—傳本《上大人》·敦煌本《上大夫》の逕庭をめぐる一考察—〉，《集刊東洋學》第 123 號（2020 年 6 月），頁 83。

數字、人名、詩歌、社邑文書等。筆者博士論文《敦煌識字寫本研究》根據《上大夫》、《上土由山水》、《敦煌百家姓》（按：博論中作《敦煌姓氏雜錄》）、《正月孟春猶寒》、《千字文》、《開蒙要訓》的內容和寫本形態，嘗試分析了它們的用途和學習順序，<sup>10</sup>然而探究的深度和廣度不足。本文以 19 件《上大夫》寫本為主要討論對象，嘗試通過寫本中各內容的書寫狀況和性質以及出現次數，結合其他相關的敦煌寫本，進一步明晰它們與《上大夫》及識字教育的關係及其在識字教育中的作用，進而總結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識字教育的特點，並就寫本所體現的識字習字方法進行說明。本文拋磚引玉，或可為敦煌蒙書研究提供新的視角，敬請方家指正。

## 二、《上大夫》寫本所見識字教育的內容與特點

按照寫本特徵，36 件《上大夫》寫本大體可以分作三類。首先為綜合識字類，共 19 件，寫本編號見下表，這類寫本中《上大夫》都與其他蒙學知識同書，書寫者的目的蓋在於將學過的知識通過書寫的方式進行記憶。這一類寫本將是本文的主要討論對象。其次為隨筆習字類，共 16 件，寫本編號為 P.2178V、P.2772V、S.264V、S.747V、S.1386V、S.2646V、S.5441、S.6019V、S.6609V、S.6960V、BD1640、BD1745V、BD1774V、BD4562V、BD6141V、BD7089，這類寫本中《上大夫》較多出現在寫本正面的餘白處或背面，都未寫完，甚至僅有幾字，蓋為書寫者隨手練習。最後為反復習字類，為 P.4900（2），<sup>11</sup>該本是初學者在老師指導下進行的習字訓練，對認識當時的習字方法有重要價值。以下對 19 件綜合識字類寫本展開介紹，以觀唐五代宋初識字教育的內容。

表 1

寫本卷號	主要內容
P.2738V	《上大夫》、《牛羊千口》、《千字文》、《尚想黃綺帖》、《送遠還通達》、《沉淪淝浪波》、《正月孟春猶寒》、《學問當時苦》、社司轉帖、敦煌鄉名、寺名、蘭若名 <sup>12</sup> 寫本正面：《太公家教》

<sup>10</sup> 拙文：《敦煌識字寫本研究》（廣島：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19 年）。

<sup>11</sup> P.4900（2）之外，BD10048V 中存「大」、「己」2 字各 1 行，疑出自《上大夫》。

<sup>12</sup> P.2738V 中《千字文》篇首和社司轉帖各出現了 5 遍，《上大夫》、《尚想黃綺帖》、《沉淪淝浪波》各出現了 2 遍，在統計各篇在《上大夫》寫本中的出現次數時，都以 1 次計算。

寫本卷號	主要內容
P.2564V	《上大夫》、《牛羊千口》、《千字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略抄》、《百行章疏》、《新合孝經皇帝感詞一十一首》 寫本正面：《晏子賦》、《斷齣新婦文》、《太公家教》
P.3145V	《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土由山水》、《黃金千萬斤》、《敦煌百家姓》、官員名、人名、敦煌鄉名 寫本正面：社司轉帖
P.3369V	《上大夫》、《牛羊千口》、《敦煌百家姓》、人名、社司轉帖 寫本正面：《孝經》、人名
P.3705V	《上大夫》、《牛羊千口》、《千字文》、《正月孟春猶寒》、《論語》、小寫數字、人名等 寫本正面：《論語》
P.3797V	《上大夫》、《牛羊千口》、《太公家教》 寫本正面：《太公家教》、《新集嚴父教》
P.3806V	《上大夫》、《宣宗皇帝御製勸百寮》、《齋文》 寫本正面：《春秋左氏傳集解》
S.1232V	《上大夫》、《牛羊千口》 寫本正面：《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S.1472V	《上大夫》、《牛羊千口》、小寫數字、當寺轉帖 寫本正面：《佛說八陽神咒經》
S.4106V	《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土由山水》、大寫數字、姓氏、人名 寫本正面：《佛說法句經》
S.5631V	《上大夫》、《牛羊千口》、《天生淳善》、小寫數字 寫本正面：《佛經戒律》、社司轉帖
S.5754V	《上大夫》、《開蒙要訓》 寫本正面：《新集文詞九經抄》
S.8668V	《上大夫》、《牛羊千口》
Дx.6050V	《上大夫》、《牛羊千口》 寫本正面：《禮懺文》
Дx.8655V	《上大夫》、吐蕃文字母表 寫本正面：《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BD3955V	《上大夫》、《敦煌百家姓》 寫本正面：《無量壽宗要經》
BD10048V	《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土由山水》 寫本正面：《維摩詰所說經》
BD13069V	《上大夫》、《牛羊千口》、《發願文》、社司轉帖 寫本正面：雜寫
P.tib.2219	《上大夫》、《牛羊千口》 寫本背面：《上土由山水》

以上 19 件寫本呈現出的內容多樣，其中諸佛經、儒經、文學寫本（《新合孝經皇帝感詞一十一首》、《齋文》、《發願文》、《禮懺文》）、德行蒙書（《太公家教》、《百行章疏》、《新集嚴父教》、《宣宗皇帝御製勸百寮》、《新集文詞九經

抄》)等,或書寫於寫本正面,與背面識字內容的筆跡不一;或即使與背面《上大府》等的筆跡一致或接近,但與識字教育的關係不大,所以這些內容非本文的探討對象。識字蒙書及識字用內容中,《牛羊千口》出現了15次,社司轉帖出現了6次,《上土由山水》、數字、人名各4次,《千字文》、《敦煌百家姓》各3次,《正月孟春猶寒》及敦煌鄉名各2次,《尚想黃綺帖》、《開蒙要訓》、《送遠還通達》、《沉淪淩浪波》、敦煌寺名、蘭若名以及吐蕃文字母表等各1次。這些內容與《上大府》同書,不僅表明它們與《上大府》的學習時間接近,屬於識字教育的內容,而且出現次數越多表明它們與《上大府》的關係越密切。

現依據各內容的出現次數及其內容性質,得出對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識字教育的主要認識有以下兩點。

#### (一) 內容難易有別且使用有序

學生入學之始,便需習字,《上大府》是普遍首用的蒙書。《上大府》之外,敦煌寫本中還有兩本習字蒙書《牛羊千口》和《上土由山水》,豐富了我們對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初級識字教育的認識。

19件寫本中《牛羊千口》出現了15次,且都緊接在《上大府》之後,為同一人所習,二者的關係非常密切。該書不見於傳世文獻,在敦煌文獻中計發現了如上15件寫本,其中4件內容完整。該書全文為:「牛羊千口,舍宅不售,甲子乙丑,大王下首,之乎者也。」首句「牛羊千口」描繪了士庶之家富裕的樣子;次句「舍宅不售」旨在告誡學生出售宅舍是不賢不孝的行為;「甲子乙丑」代表六甲;「大王下首」提示學生要以入仕為官為目標;末句「之乎者也」屬於語氣助詞,蓋倣《千字文》結尾「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兩句而來。<sup>13</sup>海野洋平先生認為該書是以初學者識字習字為目的編撰的童蒙課本。<sup>14</sup>筆者讚同這一說法,並考慮到敦煌寫本中該書都緊接在《上大府》末句「尔小生,八九子」之後,而「尔小生,八九子」表示:你們這些八、九歲的學生。因此該書似乎構成了對八、九歲的學生的訓誡內容,加之該書為四言,字的整體難度稍大於《上大府》(按:《上大府》和《牛羊千口》的平均筆畫分別為3畫和5畫),還涉及六甲知識,所以其應該是《上大府》之後補充學習的蒙書。

<sup>13</sup> 拙文:〈唐五代宋初敦煌習字蒙書《牛羊千口》探究〉,收於金滢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頁208-223。

<sup>14</sup> [日]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校釋—蒙書《上大府》の姉妹篇—〉,《一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第47號(2012年12月),頁7-22。

19 件寫本中《上士由山水》出現了 4 次，除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藏文寫本 P.tib.2219，其餘寫本中該詩與《上大夫》、《牛羊千口》是前後接書，可見三者關係頗為密切。該詩在宋以後的《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紀讚》、《敬齋古今齋·拾遺》、《水東日記·描朱》以及一些禪師語錄中有載，可確定為蒙書。敦煌文獻中該詩計有 7 件寫本，除了表 1 所列 4 件，還有 P.2896V、P.4093、BD527V，其中 P.3145V 中保存了全詩。全詩為：「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天（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立行方迴也，文才比重仁（仲壬）。<sup>15</sup>去年出北地，今日入南陰。未申孔父志，且作丁公吟。戶內去三史，門前出五音。若能求白玉，即此是黃金。」<sup>16</sup>劉長東先生認為該詩屬於習字蒙書。<sup>17</sup>該詩筆畫簡單，又與《上大夫》同書，且明人葉盛《水東日記·描朱》記載了該詩和《上大人》、《王子去求仙》一起作為當時普遍的描朱教材，<sup>18</sup>確為習字蒙書無疑。該詩共 70 字，平均筆畫為 6 畫，學習難度稍大，學習時間當緊接在上述兩種蒙書之後。

習字蒙書之外，數字出現了 4 次，P.3705V 之外的 S.1472V、S.4106V、S.5631V 中數字都寫在《上大夫》之前或《牛羊千口》之後，這一情況證明數字學習與《上大夫》是同時進行的。這 4 件寫本中，S.4106V 是大寫數字壹到拾，其餘 3 件主要是小寫數字一到十。小寫數字的筆畫簡單，在識字習字功能上與《上大夫》最為接近，無疑是最為基礎的知識。敦煌文獻中出現小寫數字一到十的寫本還有 S.5441（按：數字與《上大夫》接書）、S.6908V、P.3616V、BD3106V。另有 Dx.18938 中保存了數字「七」、「八」、「九」的反復習字，每字 1 行，行首字筆跡較好，疑為老師寫的範字。大寫數字壹到拾的寫本除了 S.4106V，敦煌文獻中還有 S.782V、S.5753V、BD15450V，考慮到大寫數字的習寫難度較大，有更強的實用性，練習時間自然晚於小寫數字。

<sup>15</sup> 劉長東先生已經指出「重仁」當校作「仲壬」，「仲壬」蓋指東漢王充，且前句中「迴也」蓋指顏回。參見劉長東：〈論中國古代的習字蒙書——以敦煌寫本《上大夫》等蒙書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92。

<sup>16</sup> 拙文：〈敦煌寫本《上士由山水》與學郎習字〉，收於金澄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140-156，又見拙著：《敦煌蒙書校釋與研究·習字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 年）。

<sup>17</sup> 劉長東：〈論中國古代的習字蒙書——以敦煌寫本《上大夫》等蒙書為中心〉，頁 192。

<sup>18</sup> [明]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10·〈描朱〉，頁 105-106。

習字蒙書《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土由山水》常一起出現，說明三者的學習時間最為接近，或已形成固定搭配，構成了當時習字的基礎，再結合三者的難易度，推知三者的學習是逐步遞進的關係。寫本中大小寫數字總是出現在《上大夫》和《牛羊千口》之前後，說明數字學習穿插在初級識字教育中，是當時啟蒙重「書計」的具體表現。

學生有了一定習字基礎後，需逐步提升識字習字的字數，開始學習綜合性識字類蒙書。鄭阿財、朱鳳玉二先生已經指出敦煌文獻中主要的綜合性識字類蒙書有《千字文》、《開蒙要訓》、《百家姓》等。其中《百家姓》是宋初才出現的，敦煌文獻中的兩件相關寫本 Dx.6066 和 P.4585+P.4630 究竟是否出自敦煌藏經洞，學界對之尚存疑慮。不過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敦煌百家姓》填補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姓氏識字蒙書的空白。

19 件《上大夫》寫本中《千字文》出現了 3 次，二者的學習時間接近。《千字文》，南朝梁時周興嗣次韻，是有名的識字蒙書和習字書帖。敦煌文獻中發現的各類《千字文》寫本計 191 個卷號，可綴合為 136 件，<sup>19</sup>寫本數量位列識字類蒙書之首，足見其在當時識字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鄭、朱二先生已指出敦煌本《千字文》有識字習字、書法臨摹的性質。<sup>20</sup>該蒙書有千字，初學者或可背誦，但用之習字則難度較大。表 1 所列 P.2738V 中有 5 篇《千字文》，不過內容不出「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10 字；P.2564V 中僅有「千字文」3 字；P.3705V 中僅有「千字文敕員」5 字。這 3 件《千字文》的筆跡稚嫩，體現的便是其識字習字的性質，而且說明由於其難度較大，在初級識字習字階段，學生僅先練習開篇部分。敦煌文獻中僅有《千字文》開篇且筆跡稚嫩的寫本較為多見，如 S.335V、P.2059V、P.3391V、BD4083V、BD9089V、BD14208V、羽 707 等，這些寫本都是學生學習了《千字文》開篇部分後進行的習作。

僅出現 1 次的《尚想黃綺帖》亦值得關注。該帖共 80 字，內容是王羲之對鍾繇、張芝書法的看法，作為王羲之書帖，在唐五代宋初敦煌及西域地區廣泛用於習字，<sup>21</sup>宋以後亡佚。迄今在敦煌、吐魯番、和田、庫車文獻中共發

<sup>19</sup> 常蓋心：《敦煌蒙書校釋與研究·千字文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 年）。

<sup>20</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25-26。

<sup>21</sup> 〔日〕池田溫：〈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論書〉，《中國書論大系月報》第 6 卷（東京：二玄社，1979 年），頁 8-12；〔日〕福田哲之：〈吐魯番出土文書に見られる王羲之習書—阿斯塔那一七九號墓文書〈72TAM179:18〉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8 號（1998

現 33 件寫本。其中吐魯番寫本 72TAM179: 17/1~4《千字文》和 72TAM179: 18/1~9《尚想黃綺帖》的習字形式一致，筆跡接近；敦煌寫本 P.2738V、P.2769、S.3287、S.4852V、S.12372、BD9089V、BD13210F+BD13210D、Dx.953V 及和田寫本 MT.b.006 中同書有《尚想黃綺帖》和《千字文》，這一現象恐不是巧合，是當時習字教育形式的體現，且說明二者的學習時間有重合。考慮到《上大夫》寫本中《尚想黃綺帖》僅出現了 1 次，且該帖非蒙書，而是王書法帖，那麼該帖的教學對象當是有一定習字基礎的學生，學習時間稍後於《千字文》。

19 件寫本中人名出現了 4 次、《敦煌百家姓》出現了 2 次，這兩種內容屬於姓氏之學，故而一起介紹。P.3145V 中的人名前接歸義軍官員名，後接敦煌鄉名、《敦煌百家姓》，從官員名「翟君使」來看（按：應為「翟使君」，此人是 10 世紀中後期歸義軍府衙中非常重要的人物），<sup>22</sup>這部分人名蓋源自當時的真實人物。P.3369V 中的人名以索姓為主，書寫較為隨意，疑為題記中學郎索什德練習的索氏名錄。P.3705V 中記錄的人名較多且書寫雜亂，是書寫者的隨筆練習。S.4106V 卷末出現的人名為「翟懷玖」、「張留德」、「馬卑末」、「祝賢員」，這幾個人名是每字 1 行，呈現出反復習字的特徵。這 4 件寫本的人名可以確認為習字，但是它們在各自寫本中皆與《上大夫》、《牛羊千口》不銜接，又無規律，應該是書寫者為了施用而進行的自主練習，它們具有啟蒙的性質，但不是蒙書，也非固定教材。

《敦煌百家姓》篇首為「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雖篇首之後內容各寫本不一，但既有部分固定內容，又與其他蒙書同書，可確定為姓氏識字蒙書。現已在敦煌文獻中統計出 15 件寫本，除了表 1 所列 P.3145V、P.3369V、BD3955V，還有 S.865V、S.4504V、S.5104、P.2331V、P.2995、P.3070V、P.3197V、P.3558V、P.3692V、P.4525（16）V、BD5673V、羽 29V。<sup>23</sup>該書原本無題，《敦煌學大辭典》、《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年 9 月），頁 29-41；張天弓：〈論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及其相關問題〉，收於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編：《全國第六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頁 36-50；榮新江：〈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在西域的流傳〉，《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00-209；〔日〕海野洋平：〈童蒙教材としての王羲之《額書論》（《尚想黃綺帖》）—敦煌寫本・羽 664 ノ二 R に見るプレ《千字文》課本の順朱—〉，《杏雨》第 20 號（2017 年 4 月），頁 117-173。

<sup>22</sup> 陳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 年第 5 期，頁 84。

<sup>23</sup> 拙文：〈晚唐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兼論其與《蒼頡篇》、

中擬名作《敦煌百家姓》，<sup>24</sup>茲從之。該書不見於傳世文獻，應該撰作於敦煌張氏歸義軍統治初期，或許是迎合張氏歸義軍政權的統治需求產生的，撰作者不明，撰作時間比傳本《百家姓》早了約 1 個世紀。<sup>25</sup>其篇首的姓氏以敦煌地區的漢胡大姓為主，帶有俗語的特徵，且與歸義軍時期敦煌的社會階層、民族關係及相關人口數量有較高契合度。<sup>26</sup>另外篇首四言句的形式當受到了《蒼頡篇》的影響，<sup>27</sup>按照姓氏地位排序的編撰方式又與宋初《百家姓》篇首「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異曲同工，為探求後者的源起和姓氏蒙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這一蒙書和人名雜寫數次出現於《上大夫》寫本中，說明姓氏之學屬於初級識字內容，其學習時間稍後於《上大夫》。

出現了 1 次的《開蒙要訓》，作者馬仁壽，成書於魏晉六朝之際<sup>28</sup>，迄今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 90 個卷號，綴合後為 57 件，數量僅次於《千字文》，是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重要的識字蒙書。該蒙書有 1400 字，內容為日常生活用字，與雜字類蒙書相似，難度高於《千字文》。《上大夫》寫本 S.5754V 中僅有標題「開蒙要訓一卷」，說明該書寫者知曉《開蒙要訓》，但是否掌握全文不得而知。

出現了 2 次的敦煌鄉名和各出現了 1 次的敦煌寺名、蘭若名屬於實用性較強的識字內容，反映了識字教育的地域性特點。敦煌鄉名除了見於 P.2738V 和 P.3145V，還見於 S.4504V、P.3706、Дx.1131V+Дx.1139BV+Дx.1149V。敦煌寺名除了見於 P.2738V，還見於 S.4504V、P.3706。這些寫本均為雜字，屬於雜字類蒙書。

---

《急就篇》、《百家姓》的關聯》，收於郝春文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頁 211-225。

<sup>24</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782；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4006。

<sup>25</sup> 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8 冊，頁 4006。

<sup>26</sup> 拙文：〈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收於郝春文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9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187-200。

<sup>27</sup> 胡平生先生從出土漢簡《蒼頡篇》中發現了〈書人名姓〉章，該章以「趙莖韓鳴，范鼠張豬」開篇。詳見胡平生：〈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蒼頡篇》殘片研究〉，收於汪濤、胡平生、〔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頁 66-67。

<sup>28</sup>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9。

出現了1次的《送遠還通達》和《沉淪淝浪波》是由同一部首字編成的「聯邊詩」，<sup>29</sup>為識字、遊戲之用。特別是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15的寫本背面中《送遠還通達》與《孝經》同書，S.3287V中與《千字文》、《尚想黃綺帖》同書，S.5513V中與《開蒙要訓》同書，說明了該詩的識字用性質。這種把字按照相同部首排列的形式還見於S.5513《開蒙要訓》、P.3616V中的「謂請諸謹語談說詩讚論討計識諡訛諛諛」、「問聞開問」、P.4683AV中的「狸猪貓狗狐猴狼猿師字（獅子）」、S.5790V中的「閱聞開開」等，足見這種識字方法的普遍應用。老師在教授學生習字的時候，也採用這一方法。如和田寫本GXW0171，內容為「開」、「門」、「問」、「聞」的習字，每字數行，行首字書法較好，為老師寫的範字，範字下為臨習字。<sup>30</sup>

以上介紹的《開蒙要訓》、敦煌鄉名、寺名、蘭若名及「聯邊詩」主要用於識字，擴充識字量，滿足日用，不過習寫難度較大，學習時間相對較晚，為有一定識字習字基礎的學生的學習對象，這一點應該是它們較少出現在《上大夫》寫本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 （二）注重實用知識的教學

上述《敦煌百家姓》、人名、敦煌鄉名、寺名及蘭若名等都屬於實用性較強的知識，可以讓學習者學以致用，滿足日常生活所需。這部分知識之外，還有社司轉帖和《正月孟春猶寒》較多出現在《上大夫》寫本中，二者實用性亦較強，是當時民間識字教育重實用的最直觀表現。

19件《上大夫》寫本中，社司轉帖竟然出現了6次，出現次數僅次於《牛羊千口》，足見其與識字教育有重要關係。社司轉帖屬於社邑文書的一種，是「社邑通知社人參加活動的通知單」。<sup>31</sup>敦煌文獻中的社司轉帖分為實用類和非實用類，非實用類包括文樣、稿、抄。表1所列P.2738V和S.5631V中的社司轉帖，內容完整，未發現使用痕跡，寧可、郝春文二先生已經判定其為抄本；<sup>32</sup>P.3145社司轉帖，內容完整，書寫工整，但涉及姓氏與卷背《敦煌百家姓》的

<sup>29</sup> 關於《送遠還通達》的相關敦煌寫本及其研究，參見張新朋：〈敦煌詩苑之奇葩——敦煌文獻中的《送遠還通達》初探〉，《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頁120-124。

<sup>30</sup> 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頁42。

<sup>31</sup> 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前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2。

<sup>32</sup> 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頁170、299。

姓氏排序一致，<sup>33</sup>可判定為抄本；P.3369V 中有「社司」2 字的習字；S.1472V 中當寺轉帖未寫完，也是抄本。因此可以確定《上大夫》寫本中出現的社司轉帖皆為習作，加之筆跡與同卷的蒙書接近，習寫者的身份應該是學生。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一書中指出很多社司轉帖為習字者抄錄，如 P.3070V、P.3211V、P.3757V、P.3666V、P.4017、北大 D246V、P.2439V、S.1408V。<sup>34</sup>可見當時抄習社司轉帖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另外，敦煌寫本 S.1359V、BD8172V、BD16275 中有社司轉帖的反復習字，更是這一文書用於識字教育的明證。

敦煌文獻中還發現了寺學學郎抄寫社司轉帖的證據。S.2894V 中與社司轉帖同筆跡的有「壬申年（972）正月一日淨土寺南院學士郎安教信、曹願長、安長子到官樓蘭喏道長坐轉經，僧曹願長茶來者」一段及《孝經》、人名等。P.3211V 中與社司轉帖同筆跡的有題記「乾寧三年（896）歲丙辰二月十九日學士郎汜賢信書記之也」及《千字文》和契約。P.3698V 中與社司轉帖同筆跡的有題記「靈圖寺學郎」及《孝經》、《百行章》、《王梵志詩》、《雜字一本》、契約等。這 3 件寫本證明了寺學學郎在學習啟蒙知識之時，也會抄寫社司轉帖。

學生學習社司轉帖，主要原因當有如下三點。其一，當時各種結社及社邑活動較多，社司轉帖是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一種文書，學生自要學習其寫作，以便日後施用。其二，敦煌文獻中保留了很多使用過的社司轉帖，說明當時部分社司轉帖經過流轉，最終為寺院保存，寺院用其紙張修補經卷或作為寺學學郎的練習紙，因而學郎經常接觸這一文書，耳濡目染，隨筆練習，成為習慣。其三，社司轉帖能出現在識字教育中，應該與其內容簡要，且有豐富的教育意義有關。一份完整的社司轉帖，「一般要寫明因何事、帶何物、在何時、到何地去取齋，遲到、不到者以及遞帖延誤者的罰則，發帖的時日和發帖者的職務、姓名等。多數實用社司轉帖在帖文後（有的在帖文前）要列上被通知者的姓名」。<sup>35</sup>茲以 P.3145 社司轉帖為例，以觀其內容特點。

#### 社司轉帖

右緣年支春座局席，次至曹保奴家，人各粟壹斗、麵一斤、  
油半升，幸請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七日卯時於主人家送納。

<sup>33</sup> [日]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一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第 46 號（2011 年 12 月），頁 27。

<sup>34</sup> 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頁 72、75、167、226、230、231、234、306。

<sup>35</sup> 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前言》，頁 12。

捉二人後到，罰酒一角；全不來者，罰酒半甕。其帖速遞相分付，不得停滯；如[有]滯帖者，准條科罰。帖周卻付本司，用憑告罰。

戊子年潤五月錄事張帖

(人名略)

此篇社司轉帖的要素完整，除了人名部分，有百餘字，與《千字文》、《開蒙要訓》等蒙書相比，可謂簡短，學習者花費不到半日便可熟讀，反復抄寫亦不費時日，可得識字習字之效。其中涉及的「帶何物、在何時、到何地」，可讓學生實踐學過的名物、數字、地名等。此篇轉帖中的物品送納地為「主人家」，而 P.2738V 中 3 篇社司轉帖提出的送納地或取齋地為「淨土寺門前」、「金光明寺門前」、「官樓蘭若門」，這 3 個地方都在同卷的敦煌寺名、蘭若名中出現過，這一情形正是識字與文書學習結合學以致用的典型表現。再者，社司轉帖從「帖至」到「用憑告罰」一段涉及時間和懲罰概念，對於學生建立遵紀守時觀念有幫助。最後，社司轉帖的人名部分則可使學生把姓氏之學融會貫通，這一點也是 P.3145 和 S.2894V 中書寫者把社司轉帖中的人名姓氏按照《敦煌百家姓》排序的原因。

順便一提，敦煌識字寫本中亦常見契約，如前舉 P.3211V 和 P.3698V 中便有筆跡與《千字文》接近的契約，這一文書在識字教育中的性質類似於社司轉帖。鄉名、人名、數字、名物等為契約的重要要素，契約本身又可培養學生的契約觀念，所以契約學習也是識字教育重視實用的具體表現之一。但由於上舉 19 件《上大夫》寫本中未發現契約，本文不對這一點展開論述。

19 件《上大夫》寫本中還出現了《正月孟春猶寒》2 次，因為該書屬於書儀的一種，所以也構成了識字教育重實用的證據之一。所謂書儀，「是寫信的程式和範本，供人模倣和套用」。<sup>36</sup>晚唐五代時人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序云：「今采其的要，編其凶吉，錄為兩卷。所（使）童蒙易曉，一覽無遺，故曰纂要書儀，敘之云耳（尔）。」<sup>37</sup>據此是知晚唐五代時期書儀學習為童蒙教育的一部分。敦煌文獻中的《正月孟春猶寒》寫本暫計為 8 件，除了表 1 列出的 P.2738V 和 P.3705V，還有 S.1163V、S.10275、P.2633、P.4994V、羽 663、羽 712，全文為：「正月孟春猶寒，二月仲春漸暄，三月季春極暄，四月孟夏漸熱，五月

<sup>36</sup> 周一良：〈書儀源流考〉，《歷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頁 95。

<sup>37</sup>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年），頁 519。

仲夏盛熱，六月季夏極熱，七月孟秋猶熱，八月仲秋漸涼，九月季秋霜冷，十月孟冬漸寒，十一月仲冬嚴寒，十二月季冬極寒。」該書囊括了四時、四孟、四仲、四季以及與月份相應的氣溫，內容或取自張敖《新集吉凶書儀》的時令文部分，<sup>38</sup>在性質上是一種簡易的書儀類蒙書。

該書出現在識字教育中，與其內容和性質有關。首先，從敦煌文獻來看，唐五代流行的書儀有《朋友書儀》、《書儀》、《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新集吉凶書儀》、《新集書儀》等，雖說如張敖的《新集吉凶書儀》是為「童蒙易曉，一覽無遺」而編纂，但是內容較長，不適合初學者誦習。而《正月孟春猶寒》僅有 12 句，包括了 12 個月的問候語，又有規律，即便是初學者，亦可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記誦，達到施用的可能。其次，該書的主體內容為時令知識，為啟蒙教育的重要組成。《南史·任昉傳》載：「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sup>39</sup>任昉八歲自製的《月儀》，當是一種包括時令知識的簡易書儀。再者，《千字文》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開蒙要訓》有「乾坤覆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春花開艷，夏葉舒榮。叢林秋落，松竹冬青。霧露霜雪，雲雨陰晴……冰寒凍冷，暖熱溫情」。<sup>40</sup>敦煌蒙書《孔子備問書》有「何謂四時」、「何謂四孟」、「何謂四仲」、「何謂四季」、「何謂八節」等條。<sup>41</sup>敦煌蒙書《雜抄》有「論三光六暗（物）六齊（六氣）三農元正三朝」、「辨四時八節」條。<sup>42</sup>這些資料說明時令知識是唐代啟蒙教育的重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 P.2633、P.4994V、羽 663 中，《正月孟春猶寒》後接抄《雜抄》的「辨四時八節」條，說明二者在當時有作為時令知識組合被習寫。《正月孟春猶寒》用 12 句話記錄 12 個月、四時、四孟、四仲、四季及相應氣溫，易於記誦，適於初學者，所以出現在識字教育中。

綜上所述，社司轉帖是一種常用文書，寺院中保存的社司轉帖為寺學學郎所常見，其本身簡潔，又具有識字、社會習慣養成的教育意義，可將學生的識

<sup>38</sup> 拙文：〈敦煌寫本《正月孟春猶寒》的源流與用途〉，收於金滢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281-293。

<sup>39</sup>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59，〈任昉傳〉，頁 1452。

<sup>40</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58。

<sup>41</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201-203。

<sup>42</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171、172。

字成果轉化為實際運用，遂成為學生在識字階段便學習的文書之一。《正月孟春猶寒》稱得上敦煌文獻中保存下來的最為簡單的一種書儀，作為寫信之時的寒暄用語具有較高實用性，且其具備基礎的時令知識，有一學兩得之效，遂成為識字教育的教材之一。這兩種內容的出現，說明敦煌的識字教育重視實用知識的學習，以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為教育目標之一。

### 三、《上大夫》寫本所見識字習字的方法

從表 1 所列 19 件《上大夫》寫本的書寫形式來看，它們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練習方式：一種如 S.1472V、P.3369V、P.3705V、P.3797V、BD10048V、P.tib.2219 等，很多內容不完整，書寫較為凌亂，隨意性很高，為學生自由練習之作；另一種如 S.4106V、P.2738V、P.3145V、S.5631V 等，各內容相對完整、前後銜接，為學生的較為正式的練習之作，或可能是老師佈置的作業。張涌泉先生推測 P.3145V 和 S.4106V 是「當時的學童據蒙師自編的識字讀物抄寫的」。<sup>43</sup>可備一說。不論是哪種方式，都說明了這些學生是通過書寫來達到識字習字的目的。

19 件寫本中雖未記錄具體的學習過程，但是把視野擴展到其他蒙學寫本的題記，就會發現學生書寫的過程其實包含讀誦、書記，甚至是聽寫。如散 655《論語集解》末題：「大中五年（851）五月一日學生陰惠達受持讀誦書記。」P.3691《新集書儀》末題：「天福伍年（940）庚子歲二月十六日學士郎吳儒賢詩（書）記寫耳，續（讀）誦記。」P.3649《雜抄》末題：「丁巳年（957）正月十八日淨土寺學仕郎賀安住自手書寫讀誦過記耳。」據這些題記可知當時學生在書寫的同時，往往伴隨著讀誦，即一邊抑揚頓挫地讀，一邊書寫，或先書寫，後讀誦。同學之間也可以互相合作，實現聽寫。如 P.2825《太公家教》尾題「大中四年庚午正月十五日學生宋文顯讀，安文德寫」；S.705《開蒙要訓》尾題「大中五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學生宋文獻誦，安文德寫」。這兩條題記中的「宋文顯」和「宋文獻」疑為同一人。<sup>44</sup>此二人在兩年間，先後練習《太公家教》和《開蒙要訓》，採用的便是一人讀一人寫的學習方式，實現了聽、讀、寫的結合。

回到《上大夫》寫本，各種識字習字內容寫在一塊，應該是學生們為了鞏固學過的知識，通過抄寫、讀寫、聽寫的方式把它們寫下來，所以寫本中既有各種初級識字習字內容的羅列，如習字蒙書、數字、姓氏蒙書等，有時也會出

<sup>43</sup> 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8 冊，頁 4127。

<sup>44</sup> 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註〉，《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頁 27。

現難度較大的雜字類內容，甚至是德行類蒙書、儒經、佛經等。學生們通過這樣的抄寫、讀寫、聽寫的反復訓練，實現識字習字的目的，如果再加上常用文書的訓練，還能實現學以致用。這些寫本是學生每日誦讀、書記的具體表現。

以上學習方法偏重於識字，《上大府》寫本中還呈現出一種偏重於習字的學習方法，即一字書寫多次。P.4900(2)《上大府》，首全尾缺，共14行，寫本右側首題朱筆「試文」，每行首字為朱筆，頂格書，從右向左為「上大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後缺）」14字。朱字下面是墨筆習字，每字習寫1行，每行11到15字不等。行首朱筆的書法好於墨筆習字，是老師所書。學生墨筆習字止於「千」字行。朱字「七」、「十」下有墨筆「咸通十年（後缺）」，該紀年的書法明顯好於前邊習字，應該是老師所寫的習字日期。朱字「士尔」下有朱筆「經開口（後缺）」等字，推測是老師的評語。墨筆習字有大有小，筆迹稚嫩，說明學生入門不久。另外，「夫」行和「乙」行第七字、「己」行約第六字，「千」行第二字有朱筆痕迹，是老師對學生書寫不規範的矯正行為。「試文」一詞說明當時有用《上大府》進行考試。

這種在朱筆範字下反復臨習的習字方法，與宋代以來的注重描摹的「描朱」（也稱「描紅」）不同，類似於現在的「臨抬頭」和書法中的「連臨」。日本學者海野洋平先生認為這種習字方法就是傳世文獻中提到的「順朱」，並主張「順朱」是在寫有朱筆（或者墨筆）範本的紙上進行習字的方法。<sup>45</sup>筆者讚同此說。敦煌順朱寫本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行首有明顯的範字（朱筆或墨筆），二是行間有矯正痕跡。如果寫本行首缺失，但行間有矯正痕跡，也視作順朱。根據這兩個特徵，筆者統計出敦煌文獻中計有順朱寫本34件，其中《千字文》18件，<sup>46</sup>《尚想黃綺帖》5件，《蘭亭序》4件，姓氏、雜字及不知名文書各2件，《蘭亭詩》、《上大府》、數字、契約各1件，由於部分寫本中同時出現了兩種內容的順朱，所以分件數與總件數有差。<sup>47</sup>學生從入學用《上大府》培養寫字基礎到用習字書帖進行大量的習字訓練，一直使用順朱，而且《千字文》、《尚

<sup>45</sup> [日]海野洋平：〈童蒙教材としての王羲之《顏書論》（《尚想黃綺帖》）—敦煌寫本・羽664ノニRに見るブレ《千字文》課本の順朱—〉，頁138。

<sup>46</sup> 筆者曾利用敦煌文獻中的《千字文》順朱寫本論述了順朱的具體形式，參見拙文：〈唐五代習字法「順朱」的具體形式——以敦煌寫本《千字文》為中心〉，收於項楚主編：《中國俗文化研究》第20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71-88。

<sup>47</sup> 34件敦煌順朱寫本的具體編號，參見拙文：〈從「順朱」到「描朱」看學童習字方法的演進——以習字蒙書《上大府》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頁20-29。

想黃綺帖》、《蘭亭序》是最為常用的順朱教材。P.3738p3 和 BD16181V 姓氏順朱、S.11969B+S.11969C 和 S.12458C 雜字順朱、Дx.18938 數字順朱及 S.1478V 契約順朱的存在，說明當時的識字教育中，不論內容性質，普遍可以用順朱的方式學習，以達識字習字的雙重效果。另外在吐魯番、和田、庫車、黑水城文獻中也發現了《千字文》、《尚想黃綺帖》、《孔子廟堂碑》以及不知名文書的順朱寫本，足見順朱在唐宋元時期的西北地區被廣泛應用。

順朱在實際運用中有兩種形式。從 P.4900 (2) 來看，老師是寫完所有範字後再讓學生臨習。從 S.2703 《千字文》來看，寫本行首和行中均有範字，且範字的位置不固定，說明老師是寫完一個範字後就讓學生臨習，等學生臨習到寫本中間位置後，再寫一個範字讓學生臨習，如此反復，每字練習 3 到 4 行，並且老師會在學生習字中途選擇一字進行矯正指導，之後讓學生繼續臨習。由此可見當時的順朱有兩種練習形式，P.4900 (2) 所呈現的形式適用於考試和習字作業，S.2703 所呈現的形式適用於當堂習字。

在順朱的影響下，學生會自己書寫字頭再臨習。P.3369V 中有兩篇《上大夫》。第一篇在寫本底端，後接《牛羊千口》，整體起「上上大大夫夫」，訖「不不受受甲」。第二篇在底本頂端，為「上上夫夫己」。這兩部分內容都是從右向左橫書，且每字寫兩遍，筆跡稚嫩，顯然是學生寫的字頭，不過因為某種原因，學生尚未臨習。同樣僅有字頭的還有 S.8197V，寫本底端有「千千字字文文敕敕員員外外散（後缺）」1 行。還有一些寫本中學生不僅寫了字頭，且做了一定的臨習，如 P.2647V 《千字文》、P.2717V 《開蒙要訓》、BD5673V 《敦煌百家姓》、S.4106V 姓氏人名習字、BD8172V 社司轉帖習字。以上 7 件寫本中，學生都寫了字頭，意圖像順朱那樣進行臨習，但要麼未臨習，要麼臨習了一部分，形式較為自由，說明這些寫本是學生自主練習的結果。寫本中的字頭當源自字帖或書法優秀的寫本，但因為部分寫本僅有字頭，部分寫本中作為字頭的字較為稚嫩，都不能稱作範字，所以這 7 件寫本不是順朱。

敦煌文獻中還有很多本來就沒有字頭或者由於寫本殘缺未發現字頭的反復習字寫本，涉及內容有《千字文》、《尚想黃綺帖》、《蘭亭序》、《開蒙要訓》、《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並序》、《史大奈碑》、《佛說地藏菩薩經》、社司轉帖以及眾多不知名文書，這些都應該是書寫者臨自字帖或者書法優秀的寫本。

吐魯番、和田及庫車文獻中反復習字寫本（包括順朱）亦有不少，涉及內容有《千字文》、《尚想黃綺帖》、《蘭亭序》、《樂毅論》、《孔子廟堂碑》、《孝經》、《海康書事十首》、《唐寫古詩習字殘片（岑德潤五言詩等）》、《唐人日課習字

卷》(按:後兩件為今人擬題)及眾多不知名文書,其中5件寫本中出現的「放」、「放書」、「做書」字樣,對認識唐代的習字方法有重要價值。吐魯番寫本72TAM179:17/1~4《千字文》有題記「(前缺)日和闡利放書」,72TAM179:18/1~9《尚想黃綺帖》有題記「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放書」,72TAM209:85/1(b)~16(b)《千字文》有習字「(前缺)放神龍二年七月日交河縣學生劉(後缺)」、「(前缺)日劉虔壽放書放(後缺)」、「(前缺)放書交河道天(後缺)」,中村不折氏舊藏吐魯番寫本《唐人日課習字卷》有「八月一日放」、「六日、八日放」、「十一日放」等記錄,和田寫本MT.b.006《尚想黃綺帖》和《蘭亭序》有題記「(前缺)生李仲雅做書冊行謹呈上」。這裏的「放」通「做」,<sup>48</sup>「放」、「放書」即「做書」,這一詞用在正式的學生題記中,是知其為時人對一字臨習多次的習字方法的一種稱呼。從吐魯番(唐西州地區)到和田(古于闐)都使用該詞,意味著這一稱呼在唐代具有一定普遍性。所以我們可承唐人之說,將這種習字方法和習字寫本都稱為「做書」。值得注意的是,72TAM209:85/1(b)~16(b)《千字文》行首字的書法明顯優於其下習字,確為老師寫的範字,那麼該寫本為順朱;而《唐人日課習字卷》中行首字與其下習字無別,非順朱。據此可知當時不論是臨習同寫本中的範字還是字帖,都是做書。那麼據現有認識而言,唐西州及于闐地區的做書指的是反復臨寫的習字方法,臨寫對象可以是字帖,也可以是同寫本中的範字。而順朱特指臨寫同寫本中範字的習字方法,也就是說順朱是做書的一種形式。

#### 四、結論

敦煌寫本對瞭解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乃至初步認識當時全國的識字教育的內容、特點、方法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據19件《上大夫》寫本中包含的諸多蒙書和非蒙書識字內容,在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對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分類的基礎上,習字類蒙書可補充《牛羊千口》和《上土由山水》,綜合性識字類蒙書可補充《敦煌百家姓》,還可增加書儀類蒙書《正月孟春猶寒》;非蒙書內容則更多,有算術知識大小寫數字,有習字書帖《尚想黃綺帖》,有雜字性質的敦煌鄉名、寺名及蘭若名,有識字用聯邊詩《送遠還通達》和《沉淪淩浪波》,還有實用性較強的社邑文書社司轉帖。另外,《上大夫》寫

<sup>48</sup> 參見〔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下卷)·史料》(東京:西東書房,1927年),頁27;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363。

本中還出現了吐蕃文字母表，這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實行雙語教學的證據，<sup>49</sup>體現了這一時期識字教育的特色。根據各學習內容的特點及其在《上大夫》寫本中的出現次數，得出對當時識字教育特點的認識有二：一是內容難易有別且使用有序；二是注重實用知識的教學。時人意圖通過識字教育，完成基礎的習字訓練，掌握寫信和社司轉帖等常用文書的寫作，既滿足部分人群對基本聽說讀寫的需求，也為希望深造之人群奠定良好的基礎。當時的識字教育尤為重視習字，不僅出現了初學者用的短小的習字蒙書，一些書帖被廣泛用為習字教材，而且大凡識字用內容都可通過反復習字的方式來學習。習字主要採用臨習的方式，唐代稱這一方式為做書。初學者在老師的指導下臨寫範字，是為順朱，有了一定基礎後學生再臨習字帖或一些書法優秀的寫本。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識字教育上承盛唐，下啟兩宋。《上大夫》、《上土由山水》等習字類蒙書是在唐前期統治者大興文教、推行科舉制的影響下出現的。《千字文》、《尚想黃綺帖》等書帖被廣泛運用於識字教育與唐前期統治者重視書法尤其是喜好王羲之書法有密切關係。豐富的識字寫本和多樣的識字形式再現了盛唐文化和教育之一斑。敦煌識字類蒙書又為後世蒙書體系「三百千」之濫觴。《上大夫》開三字蒙書之先河，對後世蒙書影響很大。《三字經》中「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和「彼既成，眾稱異，爾小生，宜立志」等句有模倣《上大夫》的痕跡。<sup>50</sup>《敦煌百家姓》在形式和用途上與宋初《百家姓》基本一致，為探究後者的源起和運用提供了寶貴線索。《千字文》在唐代已是全國普遍使用的蒙書，敦煌寫本對窺探該蒙書的學習形式具有珍貴價值。總之，敦煌寫本可證兩宋以來「三百千」的蒙書體系早在唐五代時期就已見雛形。

## 徵引文獻

### 專著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明〕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sup>49</sup> 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05。

<sup>50</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古代蒙書精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1、82。

-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古代蒙書精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20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任占鵬：《敦煌蒙書校釋與研究·習字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常蘊心：《敦煌蒙書校釋與研究·千字文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  
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東京：西東書房，1927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金娥：〈敦煌藏經洞所出識字類蒙書略論〉，《語文學刊》第37卷第5期，2017年10月。
- 任占鵬：〈敦煌寫本《正月孟春猶寒》的源流與用途〉，收於金澧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敦煌寫本《上土由山水》與學郎習字〉，收於金澧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 ：〈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收於郝春文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論唐代敦煌蒙書《上大夫》與後世《上大人》的關係〉，《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3期，2021年5月。
- ：〈唐五代宋初敦煌習字蒙書《牛羊千口》探究〉，收於金澧坤主編：《童蒙文化研究》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唐五代習字法「順朱」的具體形式——以敦煌寫本《千字文》為中心〉，收於項楚主編：《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20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 年。
- ：〈晚唐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兼論其與《蒼頡篇》、《急就篇》、《百家姓》的關聯〉，收於郝春文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 ：〈從「順朱」到「描朱」看學童習字方法的演進——以習字蒙書《上大人》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1 期。
- 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註〉，《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
-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 年第 8 期。
- 周祖謨：〈敦煌唐本字書敘錄〉，收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
- 周一良：〈書儀源流考〉，《歷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
- 胡平生：〈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蒼頡篇》殘片研究〉，收於汪濤、胡平生、〔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
- 陳菊霞：〈翟使君考〉，《敦煌研究》2009 年第 5 期。
- 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2014 年第 1 期。
- 張新朋〈敦煌詩苑之奇葩——敦煌文獻中的《送遠還通達》初探〉，《敦煌研究》2016 年第 5 期。
- 劉長東：〈論中國古代的習字蒙書——以敦煌寫本《上大夫》等蒙書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
- 〔日〕池田溫：〈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論書〉，《中國書論大系月報》第 6 卷，東京：二玄社，1979 年。
- 〔日〕海野洋平：〈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史料輯覽〉，《一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第 46 號，2011 年 12 月。
- ：〈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校釋—蒙書《上大人》の姉妹篇—〉，《一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第 47 號，2012 年 12 月。
- ：〈童蒙教材としての王羲之《額書論》（《尚想黃綺》帖）—敦煌寫本・羽 664 ノ二 R に見るプレ《千字文》課本の順朱—〉，《杏雨》第 20 號，2017 年 4 月。

——：〈敦煌童蒙教材《牛羊千口》再論—傳本《上大人》·敦煌本《上大夫》の逕庭をめぐる一考察—〉，《集刊東洋學》第123號，2020年6月。  
〔日〕福田哲之：〈吐魯番出土文書に見られる王羲之習書——阿斯塔那一七九號墓文書〈72TAM179:18〉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8號，1998年9月。

#### 會議論文集

張天弓：〈論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及其相關問題〉，收於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編：《全國第六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

#### 學位論文

任占鵬：《敦煌識字寫本研究》，廣島：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19年。

宋新民：《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